

有關蘇聯各民族文字 創制史的問題

謝爾久琴柯教授著



55.12.0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編譯
中央民族學院

有關蘇聯各民族文字 創制史的問題

謝爾久琴柯教授著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編譯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一九五五年・北京

序

本書是蘇聯各民族文字創制史的簡明教程。這個教程是我在1954——55學年期間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爲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中央民族學院和北京大學的教師和研究生所講的。這個教程是在我1951年到1953年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所做的工作的基礎上寫成的。

從俄文譯成中文的工作主要是由劉湧泉同志完成的。他還是我講課當中的一個經常的助手。藉此本書刊印之際，對他的巨大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馬學良教授和傅懋勣教授審閱了譯稿並照料有關本書刊印的事宜，在此向他們一並致謝。

格·謝爾久琴柯教授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

目 錄

序

導 言	1
（一）俄國沙皇制度在民族語言問題上的政策	4
（二）沙皇俄國時代進步的文化活動家對民族語言問題的看法	10
（三）列寧斯大林民族語言政策的一般原則	15
（四）阿拉伯文和老蒙文字母	21
（五）蘇聯制定拉丁化文字的時期	34
（六）蘇聯東干族拉丁化文字以及三十年代初期在蘇聯制定的 漢語拉丁化文字	43
（七）土耳其文字拉丁化	59
（八）創制拉丁化文字時所犯的錯誤和轉用俄文字母的原因	61
（九）俄文字母的優點以及革命前和蘇維埃時代東方各族語言 對它的應用	74
（十）音位理論在制定文字中的作用	88
（十一）以俄文字母為基礎而制定的蘇聯各族文字和新蒙文	102
（1）埃文基文字母	
（2）烏茲別克文字母	
（3）維吾爾文字母	
（4）納納茨文字母	

(5) 莫爾多瓦語的一種字母

(6) 阿巴津文字母

(7) 東干文字母

(8) 蒙文字母

附錄一：問題解答

附錄二：俄文、英文、法文、德文、國際音標、注音字母的漢語語音
對譯表（以北京音為準）

附錄三：俄文、英文、法文、德文、國際音標、注音字母的漢語音節
對譯表（以北京音為準）

導 言

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隨着人類社會的出現而產生的，隨着人的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語言和意識同樣古老”，“語言跟意識一樣，只是因為需要，因為迫切需要和別人交際才產生的。”（註一）列寧把語言叫做“人們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列寧對於認識過程中語言和思維相互關係的問題非常重視，因此對作為“組成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那些知識領域”之一的語言史賦與特殊重要的意義。斯大林說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

可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來看，語言的主要功用是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交際工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人的思想是在人們相互交際的過程中藉助語言而產生和實現的。斯大林同志在這一點上指出：人的思想“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註二）

因此，語言一方面是人們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時是構成思想的工具。語言把人的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每個人都很清楚，如果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的鬥爭中，在為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調協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人類社會生產行為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

斯大林同志公正地指出：“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註三）

（註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0—21頁。

（註二）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38頁。

（註三）同上第40頁。

語言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這種作用更加巨大了，因為蘇聯千百萬不同民族和說不同語言的人積極參加了社會政治生活，參加了發展社會經濟和文化政治生活的活動。

蘇聯各個民族文化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以及這些民族語言的廣泛和經常的使用是多民族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規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年來在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方面獲得了巨大成績，漢族本身的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提高了很多。

掃除文盲、發展國民教育、吸引羣衆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所有這些都要求先給過去沒有文字的民族創制文字和建立標準語，以及改革、改進現有的、阻礙文化革命、大衆文化高漲的古體文字。

蘇聯在研究蘇聯各族人民的語言工作方面有很多經驗。我在講課裏，首先來談談蘇聯在爲各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方面而進行的那些工作，當然，也還要闡述一些其他問題，如那些和解決文字問題有關的理論問題。

當然，在這比較短的教程裏，我不能充分地闡明所有的這些問題，因此我要談的只是這些問題中基本的東西，和我看來是最主要的東西。

有關蘇聯各民族文字創制史的問題

文字問題在語言學問題當中佔有重要位置。文字的歷史和語言的歷史以及和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有密切聯系。正是因此，文字問題一向不僅是引起語言學家的關心，而且還引起歷史學家，特別是文化歷史學家的關心。在其他一些跟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相聯系的因素當中，文字對語言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約·維·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指出：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註一）就已萌芽。那時，人類的語言是不複雜的，基本詞彙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語法構造，雖然這種構造是很原始的，但總算是語法構造。

約·維·斯大林寫道：“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註二）

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通常是不斷影響語言的變化和發展的。當然，文字所表達的那個語言也會影響文字。語言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的特點時常規定文字的性質，也就是規定有各種不同變體的表意文字，音節文字，字母文字的性質。

蘇聯在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下，為蘇聯許多不同語言的民族（Народ 泛指的民族——譯者註）創制了和改進了文字，這一項工作是史無前例的，同時具有不可估計的社會、政治和科學的意義；這一項工作曾用去了許多科學家和實地工作者——語言學家、教育學家和出版工作人員——很大的勞力。

和改革舊字母及創制新字母相聯系着的是：研究要創制文字的語言的各種方言（有時數目是很多的），並首先是整理出語言中存在的

（註一）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4頁。

（註二）同上。

音位（Фонема），也就是說整理出用來區分意義和詞的形式的基本語音。如果事先對那些還沒有文字的語言的各個方言未作研究，那就不能解決選擇標準方言（註一）（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диалект）的問題，不能解決字母的問題。制定正字法和術語不僅要嚴格地估計到語音的特點，而且要估計到一切詞彙、語法的，換句話說就是結構的特點。創制民族的文字——這是發展標準（書面）語的第一步。

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的繁榮，用幾十種不同語言寫作的一批一批的新作家不斷參加到文學的行列裏來，這些都鮮明地證實了下面這一事實：蘇聯很多說不同語言的民族在蘇維埃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創制新文字和改革舊文字的工作對發展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在蘇維埃國家裏，曾進行過用拉丁文字母制定的文字來代替古阿拉伯文和老蒙文字母的運動，從這一運動的發生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字後來又普遍地廢除了拉丁字母，轉用俄文字母，這一事件的開始到現在也已經十五年多了。

蘇聯民族語言工作的豐富經驗是蘇聯各族人民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文化，也就是民族語言的文化成長和繁榮的巨大指標之一。這些經驗老早就已受到外國的極端重視，首先是歐洲和亞洲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重視。蘇聯的經驗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它已經對蒙古人民共和國語言文字的發展有了不少好的影響；目前偉大的中國各族人民以及正在和美帝國主義侵略作英勇鬥爭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疑地也希望利用這些經驗。

因此，在我的講課裏除了簡短地、系統地敘述一下蘇聯創制和發展新的以及發展改進過的民族文字的歷史，同時也描述一下蘇聯在解決文字的一些問題上所給與東方個別國家的那些好的影響。

一 俄國沙皇制度在民族語言問題上的政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說好幾十種語言的民族居住在它的領土上。這些語言大多數只是蘇聯有。其中有

（註一）即基礎方言——譯者註。

東部斯拉夫語言，波羅的語言，高加索語言，北方各族人民的語言，此外還包括所謂的原古亞細亞語言（Палеазиатские языки），絕大部分的突厥語，烏喀爾芬蘭語和通古斯滿洲語，有不少的伊朗語和蒙古語，阿爾明尼亞語和其他一些語言。

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爆發之前的年代裏，現今已加入蘇維埃聯盟的各族人民曾經是處在經濟文化發展的各個不同的階段。同時，由於沙皇制度對沙皇俄國邊疆各民族和說各種語言的居民施行了民族壓迫和不平等的政策，很多民族那時是居於非常低的發展階段。

約·維·斯大林在“蘇維埃政權對於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一文中公正地寫道：沙皇制度爲了使大衆處於奴隸和愚昧無知的境地，有意識地在俄國邊疆培植宗法的封建壓迫。沙皇制度不僅排擠，而且有時乾脆就取消地方的學校，戲院和一些教育機構，它所以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使人民大衆愚昧無知。沙皇制度杜絕了地方居民先進代表的一切主動性，它打擊了邊疆人民羣衆的一切積極性，這一切便促成了地方居民“對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極端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有時便變成了敵對態度”。（註一）

沙皇制度是如何對那些能够促進俄羅斯帝國各族人民的語言、文化和自覺有所發展和提高的活動進行迫害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材料可以用來說明。一八六三年，沙皇大臣瓦盧耶夫在談到用烏克蘭語進行教學的學校時，他曾宣佈烏克蘭語“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政府這個特別的命令發布不久，烏克蘭語就在學校、法庭、戲院、出版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方機關裏禁止使用了。直到沙皇制度統治的最後幾年，還對於用烏克蘭文出版文獻一事進行一切可能的限制。一九〇五年，尼古拉第二（Николай II）在內閣提出的有關取消限制使用“小俄羅斯”語出版書籍的呈子上加上了如下的批語：“等待時機”（註二）。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國家杜馬

（註一）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356頁（俄文版）

（註二）參看「東方文化和文字」，第四卷（1930年巴庫出版）「關於沙皇制度異族文字政策的資料」一文。

曾就烏克蘭的學校問題，討論了烏克蘭語可能使用的範圍問題。列寧在他的“尼康（Никон）主教是如何保護烏克蘭人的”（註一）一文中揭露了國家杜馬在提出這一問題上的赤裸裸的民族主義的、黑邦派的本質。

想在家庭範圍之外使用別洛露西亞語的任何願望都受到了系統的迫害，不僅如此，別洛露西亞語曾有一度竟被說成是“不存在的”；曾經對立陶宛語和波蘭語也進行過一切可能的和長期的限制，儘管像波蘭語這樣的語言是擁有古老文化的語言，是擁有千百萬人口的語言。

民族壓迫和強制俄羅斯化的政策對於所有沒有文字的“異族”（Инородец）曾經是十分普遍地施行的，在這些所謂的“異族”中有伏爾加沿岸、西伯利亞，高加索，蘇聯北部，中亞細亞的各個民族，以及其他很多民族。

正如國民教育部許多文件中所敘述的那樣：學校裏所以承認非俄羅斯居民的本族語言，是因為要使它們充當進行“基督教教育和使異族兒童全盤俄羅斯化”（註二）的不可缺少的準備工具。

只有宗教的書籍才許可譯成本地居民的語言。“連贊同大量翻譯和用異族各方言出版書籍的念頭也是不允許的。然而出版那些包括聖神歷史事件的新約四福音書和基督教教義，可以有例外”（註三）。沙皇政府一方面阻礙帝俄各民族邊區的經濟發展，而另一方面在文化領域內千方百計地阻礙當地語言和文學的發展。我們在國民教育部的指示文件裏可以看到這樣的字句：企圖給那些從來還沒有文字和文學發展的方言創制文字，並使其在文學上有些發展，企圖把這些方言提

（註一）見列寧全集十九卷，341—342頁，列寧揭露了尼康主教那些要求的全部癡惡的，黑幫派的內幕。尼康主教曾宣佈：「烏克蘭人民並不尋找那種聲名狼藉的自治和恢復德涅泊河下流之查波洛什哥羅克組織之所在地，烏克蘭人並不是分離主義者，烏克蘭人不是異族，他們是自己的人，是我們的親兄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應該把他們限制在語言上，限制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上，不然，我們就要把自己的兄弟看成和猶太人，波蘭人和洛魯吉亞人等的真正異族一樣了。」

（註二）「異族教育問題論文和文件集」，1839年聖彼得堡出版。

（註三）同上，第17頁。

高到學校和教會語言的水平，這不會引起助長其慾望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嗎？要知道語言就是民族。你肯定語言的文字，使它在文學上加工，說明它的語法規律，並在教堂和學校裏使用這種語言，因而你就要肯定和發展他們為相應的民族。”（註一）

“異族”學校最迫切和最主要的任務是進行“基督教教育”，這樣就會“使學生們在出校之後，既成為善良的基督教徒又成為善良的俄羅斯人”（註二）

“國民教育部公報”這個官方刊物曾露骨地寫道：“我們不關心韃靼人，楚瓦什人和馬里人識字教育的發展，（當然其他方面也是一樣——作者加的）和這些方言的文學加工。我們所關心的僅僅是他們的基督教教育，（儘管開始時還需藉助於他們原有的方言進行這種教育），以及把他們教育成懂俄語和俄文的人”。（註三）

列寧在“論國民教育部的政策問題”（註四）這篇文章裏痛斥了國民教育部所執行的“愚弄國民意識”的政策，（註五）對於這個教育部的名稱列寧極其恰當地寫道：“國民『教育』部，請原諒我這樣稱呼。”（註六）

政府的這個政策是和上層統治階級以及俄國黑幫貴族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在斯托雷平反動的日子裏，“忠良”的貴族在其第七屆代表大會上關於「異族」學校和教育的政策曾作過這樣規定，在代表大會的文件上寫道：“學校是國家的，學校應成為俄羅斯民族愛國主義的學校。政府的學校不可能具有異族的特徵。

在學校裏，國語應毫無折扣地佔統治地位，必需用俄語進行教學。要知道俄國是一個各種不同部族的集合體。難道我們將有意識地力求建立部族的分離主義，讓各個部族都表現這種分離主義嗎？我們貴族

（註一）「異族教育問題論文和文件集」，第16頁。

（註二）同上，第20頁。

（註三）同上，第52頁。

（註四）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113—132頁。

（註五）同上，第113頁。

（註六）同上。

應該說，學校是俄羅斯的學校，俄國是俄羅斯人的俄國”。（註一）

我們在格勒梅尼斯基（С. Греницкий）所著的“錫爾河地區的異族教育情況”（註二）這本書裏發現：這本書幾乎逐字地重複一八六七年國民教育部的觀點：“發展當地方言和使之日趨完善以及利用這些方言在俄國異族居民中傳播文化教育——從國家的觀點來看，追求這樣的目的未必是有根據的……看來，對待異族方言最適當的辦法，是採取置之不理和忽視的方法，而絕不能犧牲國家利益使這些語言發展和日趨完善”（註三）（重點原文就有）。因此，一九一六年沙皇俄國國民教育部的官員甚至認為：想使當地各民族語言變成標準語的意圖也是絕對不可容忍的，原因是標準語會促使講這些語言的人民的文化向更高的階段發展。

沙皇政府總是以否定的態度解決擴大各種地方語言的權限問題，即使是學校教育或者地方文牘也不准使用這些地方語言。“所有的地方語言都一律服從俄羅斯語言”（註四）——這就是沙皇教育大臣傑梁諾夫的官方指令。

有關沙皇政府在中亞細亞建立的學校的材料用來說明沙皇制度對民族邊區教化政策的特點，是可以表徵一切的。在這個地方設立了所謂的俄羅斯地方學校……學校的人數在本地居民的比例中，佔很小的百分比。根據一九一二年的材料150,110個本地兒童中，才有3,033個進學校。如果我們從個別地區的材料來看，那我們就會找到更能說明問題的數字。如在撒馬爾汗省，74,569個本地兒童中才有635人受過教育，他們僅佔0.9%。在費爾干省，進學校的兒童僅佔本地兒童總數的0.5%。也就是165,910個兒童中才有805人進學校，在裏海以東地區，入學兒童僅佔1.4%。

一九零五年，國民教育大臣格佐夫在給尼古拉第二的報告書中寫

（註一）引自「東方文化和文字」雜誌，1931年莫斯科出版，第七、八期，第116頁。

（註二）1916年塔什干出版。

（註三）同上。

（註四）引自國民教育部檔案，見1930年出版的「東方文化和文字」第六卷第13頁「關於沙皇制度異族文字政策的資料」一文。

道：“高加索每五百五十萬人中才有四千個小學畢業生”。

沙皇政府認為：只有在本地居民普遍沒有文化的條件下，本地居民中極小部分的特權階層，如地方領袖人物和未來的翻譯後備力量等，才有可能進入學校學習。

在極少數的情況下，當給“異族”創造文字時，政權的代表者們，有時還有一些像奴才似地追隨着這些代表者們的科學家認為在創造字母時不需要考慮語言的特點，下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八六七年，土耳其斯坦出名的省長將軍考弗曼（Кауфман）向國民教育大臣提出特別的詢問，在什麼程度上和用什麼形式應該使用俄文字母並藉助它表達卡查赫語言（註一）。考弗曼寫道：“我個人在這種場合的意見是必須使所有的學區，其中也有異種居住的學區，在採用……俄文字母時應該是和現在學校裏所學的俄文字母一樣，不能有任何的改變，也不能補充一些區別發音的符號和其他符號。

奧倫堡（Оренбург）學區的督學拉夫洛夫斯基（Лавровский）在寫給教育部類似這樣的信時，曾這樣說：“最好的，最可靠的，最簡單的方法是把俄文字母毫無補充和毫無改變地應用到韃靼語裏，基爾吉茲語裏（作者認為這裏基爾吉茲＝哈薩克）。

教育大臣就把這一問題交給了聖彼得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處理，語文系的覆文中提到：系裏只有何渥利松（Хвольсон）洛贊（Розен）和察加列利（Цагарели）三人曾表示：用俄文字母轉譯上述語言時，應注意這些語言的語音，並且按照他們的意見，應該作一些有益的補充，也就是說在表示突厥—韃靼語言的元音 *u* 和 *eu*（按法文的讀音）時，應增加 *ü* 和 *ö* 二字母，在表示舌根鼻音 *h*（сагыр нун）時，應增加“*h*”這一字母，因為俄文字母中沒有這樣的音。

又說：“系裏其他的學者對這三個純科學觀點的學者的意見絲毫未反駁，然而竟拒絕承認上述的補充是必要的，原因是他們是從非常

（註一）關於「把俄文字母應用到異族語言上」的通信集，一八八三年出版於嘉桑；引自一九三〇年巴庫出版的「東方文化和文字」第六卷第9—11頁，「關於沙皇制度異族文字政策的資料」一文。

重要的實際的和政治的角度着眼的。……

這就是舊俄羅斯時代輕視“異族”語言文化特點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二 沙皇俄國時代進步的文化活動家對民族語言問題的看法

以先進作家，革命的批評家，也就是民主主義者和俄國教育家的左翼爲代表的俄國進步的社會人士在教育的領域內和沙皇制度的反動政策進行過不斷的鬥爭。

在反對農奴制和專制制度的同時，俄國文化界的進步活動家劇烈地反對沙皇制度壓迫其他民族的政策，他們想藉此提高這些民族的民族自覺，發展他們的民族文化，培植他們的革命民主思想，以及對本族語言和俄語的尊重，並力求介紹他們認識先進的俄羅斯文化。他們之間的人物應該特別提出來的是：維·格·別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柯·德·烏辛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恩·格·車爾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和恩·阿·杜勃洛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爲了堅決反對農奴制和與其相聯系着的農奴制教育，維·格·別林斯基提出了教育的基本任務是：把人培養成有革命思想，渴望自由，反對農奴制的戰士和全面發展的公民和愛國者。在別林斯基關於當時住在俄國的那些“異族”的生活所發表的一切言論中都貫穿着一種高度仁愛的感情。這一點在他的“薩摩耶人（Самеды）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註一）一文中表現得最爲明顯，他在那篇文章中尖銳地斥責了沙皇制度的少數民族政策。

“尊重人的稱號，只要他是人，就要無止境地愛他，不必管自己的個性，不必管他的民族、信仰和地位，甚至於不必管他的個人身分

（註一）別林斯基全集，第十三卷，一九四八年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第196—202頁，本文是批評符拉基米爾·伊斯拉文（Владимир Иславин）所寫的那本同樣題目的書。

——總之一句話，對人要無止境的愛，無止境的尊重，甚至對那不出名的人，也應這樣……這種愛和尊重應該是人所固有的，應該像空氣一樣對他那麼重要，應該是人的生命。”（註一）——按照別林斯基的看法，這就是全部教育活動的基本思想，所有當代俄國社會的先進教育家都應該為它服務。

別林斯基認為：學習本族語言（Родной язык）及其文獻在兒童智力教育上應該起主要作用。他在評論教科書和其他教育學文獻時，特別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了這一點。別林斯基認為：語言是和思維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他在他那最有意義的“俄語語法基礎”（註二）一書中簡明地敘述了他那個時代對語言和思維、語法和邏輯問題的一些最新見解。在這裏，別林斯基曾寫道：“因為詞是和思惟緊密聯系着的，所以語法是和邏輯緊密聯系着的，並應該是以邏輯為基礎的。”（註三）

別林斯基和他同時代的卓越的俄國作家——格里勃也多夫，普希金，萊蒙托夫等人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教育思想也會影響了很多當代俄國各民族的人民文化教育的卓越活動家。（註四）

著名的文化活動家，阿捷爾拜疆人的啓蒙學家阿巴斯·庫利·阿加·巴基漢諾夫（Аббас-Кули-Ага Бакиханов）（1794—1845）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巴基漢諾夫富有廣博知識，精通一些東方和西方的語言，跟格里勃也多夫、普希金有友誼關係，因此對本族語言在兒童智力教育上和和人民社會政治生活中能起什麼作用這一點上，別林斯基的思想對他是十分熟悉的。巴基漢諾夫認為：那時在阿捷爾拜疆封建上層分子中通行的波斯語和教會學校學習的阿拉伯語對居民文化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因此，他堅決要求學校內使用學生的本族語言進行教學。

（註一）別林斯基：教育學選集，一九四八年俄羅斯教育學院出版局出版，第59—60頁。

（註二）別林斯基全集，第三卷，一九〇一年。

（註三）同上，第81頁。

（註四）見梅登斯基（Е. Н. Медынский）「教育學史」，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國家教育出版社出版，第357頁及其他。

在別林斯基和赫爾岑的直接影響下，另一個阿捷爾拜疆大的啓蒙學家米爾扎·法塔利·阿宏多夫（Мирза-Фатали Ахундов）（1812—1878）的進步的民主主義的世界觀形成了。阿宏多夫在他的著作中更多地注意到語言問題和教育學問題，他要求用本族的，即阿捷爾拜疆人民的語言來教居民，並且以他的文學活動促進了清除古土耳其字（Османизм），古波斯字（Фарсизм）和阿拉伯字（Арабизм）而純潔本族語言的工作。

跟萊蒙托夫有友誼關係的，並且深深感受了當代俄國先進思想影響的卡巴爾達（Кабардинский）的啓蒙學家蕭拉·別克—穆爾金·諾格莫夫（Шора Бек-Мурзин Ногмев）（1801—1844）由於關心使用本族語言教育自己的人民，因而編寫了第一部卡巴爾達語語法。

偉大的俄國教育學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維奇·烏辛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шинский）（1824—1870）以人民性的原則奠定了他的教育體系的基礎，他寫道：“那些奠基在抽象理論基礎上或從外族借來的最好的教育體系都沒有人民自己創造的和奠基在人民的原則上的教育體系來得有教育力量。”（註一）

按照烏辛斯基的看法，本族語言是人民性的最好的表現，可見，學校教育只應該用學生們的本族語來進行。烏辛斯基曾帶着深厚的感情描述過本族語言，同時指明了它的巨大的教育意義。

我們在他的“本族語言”一文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字句：“……在人民語言的光輝深處反映出來的不僅是祖國的自然，而且還有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部歷史。人民一代一代相繼地過去了，然而每一代人的生活成果始終是保存在語言裏，留給了後世。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把深刻的內心感受的成果，把歷史事件的結果，把信仰、觀點，把經受過的苦痛和快樂的痕跡都積累在本族語言的寶庫裏——總之一句話，人民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跡都慎重地保藏在本族語言裏。語言是最有生命的、最豐富的和最持久的聯系工具，這種聯系工具把過去的、現在

（註一）烏辛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教育學論文選」，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國家教育出版社出版，第65頁。